

# 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郭明 高大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关键词：巴蜀印章；考古学视角；战国时期

巴蜀印章是指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sup>[1]</sup>一般认为巴蜀印章是巴蜀文化的特征器物，是判断其出土的单位是否为巴蜀文化遗存的标志之一。以往对巴蜀印章的研究，多围绕印章本身展开，或讨论其外观、形制，或研究图语符号的组合，或讨论图语符号是不是文字、如何释读，或从玺印的角度讨论其性质、功用、源流等问题。<sup>[2]</sup>

学界一般认为船棺葬也是巴蜀文化的特征。<sup>[3]</sup>那么巴蜀印章与船棺葬关系如何？究竟何人可使用巴蜀印章？它与使用者的等级、身份有无关系？代表怎样的社会人群？性质、功用如何？这些都是以往较少关注的问题。仅通过对巴蜀印章形制的划分、印面符号的解读，都无法回答，只有将其至于考古学的背景之下，展开系统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找到答案。本文在考古学的视角下，在对几个规模较大且公布材料较为详细的巴蜀文化墓地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对其他典型的巴蜀墓葬的考察，讨论以上问题。<sup>[4]</sup>

## 一 什邡城关战国墓地

四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自1988年发现，至2002年，共发掘23次，清理了98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按葬具的差异可分为船棺葬、木板墓、<sup>[5]</sup>木椁墓、无葬具的土坑墓<sup>[6]</sup>四类。四类墓葬各自并无专门的分布区域，而是相互渗透、杂处。但近百座墓葬，仅有6座存在3组打破关系。墓地分六期八段，时代从战国早期早段到西汉中晚期。<sup>[7]</sup>发掘者认为什邡城关墓地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巴蜀文化系统，<sup>[8]</sup>学界普遍认可这一观点。

时代属战国的墓葬有82座，<sup>[9]</sup>其中船棺葬49座（45座为单人墓，4座为合葬墓）、木板墓2座、土坑墓31座。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仅4座，占战国墓葬比 $\approx 0.05$ 。4座墓葬中船棺葬仅1座，其他3座均为土坑墓，船棺葬在随葬印章的墓葬中比值为0.25。出土印章的墓，时代均较晚，2座为战国中期偏晚，1座为战国晚期偏早，1座为战国末期。

先看船棺葬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 M33, 在 49 座船棺葬中占比仅  $\approx 0.02$ , 在保存完整的 37 座船棺葬中占比  $\approx 0.03$ 。<sup>[10]</sup>

M33 的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墓室口部面积约 6.7 平方米, 在未被破坏的 37 座船棺葬中仅排第 12 位。一般认为墓室面积的大小与墓主身份的高低有关, 若如此, M33 墓主的身份显然不是最高的。49 座船棺葬 (53 具船棺) 中有 8 具船棺形体巨大、制作讲究, 舱、舷俱在且较深。从船棺体量、制作细节来看, 这 8 具船棺的墓主可能属同一阶层, 但仅 1 具出土了印章, 说明印章并非墓主等级、阶层的象征。因尸骨保存不好, 葬式无从考察。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 出土印章的墓, 随葬品数量均相对较多, 但并不是随葬品数量多的墓葬, 就出土印章。M33 出土 16 件随葬品; 未出土的印章的墓葬中, 随葬品数量比 M33 多的有 5 座。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 M33 与其他 40 余座船棺葬一样随葬了圆底罐, 且随葬了什邡墓地多见的釜甑。其独特之处在于随葬的 8 件铜器中, 饰物占了很大比重, 包括瓶形饰、双鱼饰、猪形饰、旗形饰各 1 件。M33 也是 49 座船棺葬、73 座战国墓、甚至什邡墓地发掘的 98 座墓葬中, 唯一随葬此类器物的。这些形制特殊的器物, 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再看土坑墓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 M10、M54、M95, 在 31 座土坑墓中占比  $\approx 0.1\%$ , 在保存完整的 16 座土坑墓中占比  $\approx 0.19\%$ 。

年代为战国末期的 M95, 墓室口部面积 11 平方米, 是土坑墓中墓室面积最大者。但 M10、M54 的墓室面积分别为 5.4 和 5 平方米, 在保存完好的土坑墓中分别为第 12、13 位, 仅有 4 座墓的面积比 M54 小。据此推断, 就土坑墓而言, 是否随葬巴蜀印章, 与墓室的大小无关。土坑墓的尸骨保存相对较好, 有 4 座墓葬的葬式可辨。出土 2 枚印章的 M10 为二人合葬墓, 均仰身屈肢。但同为仰身屈肢葬的 M49 却未随葬印章。

采取侧身屈肢葬的 M88, 墓室面积 4 平方米; 采取仰身直肢葬的 M52, 墓室面积为 5.6 平方米, 亦未随葬印章。推测葬式的差别与是否随葬印章无关。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 与船棺葬情况相似, 出土印章的土坑墓, 随葬品数量均相对较多, 但并不是随葬品数量多的墓葬, 就出土印章。随葬印章的 M95 和 M25 均出土 34 件器物。但未随葬印章的墓中, 战国早期的 M25 和战国晚期的 M49, 均出土 34 件器物; 战国晚期的 M38 虽遭破坏, 可辨别的随葬品仍有 33 件。可见随葬品数量的多寡, 也即墓主拥有的财富的多寡, 与是否随葬印章并无必然联系。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 3 座出土印章的墓葬并无明显的特别之处。就陶器而言, 三墓与其他二十余座墓葬一样, 均出土了陶豆和陶圆底罐; 陶釜、陶釜甑、陶器盖虽非每座墓葬皆有, 但也属什邡墓地常见的器物。就铜器而言, 三墓出土的器物也多为什邡土坑墓常见的器形, 唯铜盘、铜璜形器、铜釜铃较少见。但未随葬印章的 M98、M100 亦出土铜盘; M98 出土铜釜铃; 土坑墓中虽仅出土印章的 M54、M95 随葬了铜璜形器, 但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 M27 亦随葬 1 件铜璜形器。可见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 随葬印章的土坑墓无明显特别之处, 唯铜璜形器可能与印章有关, 但仅 M27 一例孤证, 似不足为据; 且随葬印章的 M10 未见铜璜形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什邡城关墓地出土较多青铜兵器, 这些铜兵器上大多有图案、符号。虽然有些符号既出现在铜兵器上, 又出现在印章中, 但同一座墓出土的印章和青铜兵器上的图案、符号并不相同。

总而言之, 就什邡城关战国墓葬的材料来看, 是否随葬印章与墓葬的形制、规模、葬俗、葬式; 墓室面积的大小; 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均无明显关系。就什邡城关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 印章应非墓主生前阶层、等级的象征, 与墓主的财富也无过多关系。我们尚不知道巴蜀墓葬中采用不同的葬具是否与族属有关, 若有关, 则印章

与族属似也无必然的联系。随葬印章的墓均出土铜质兵器和生产工具,就以往的认识来看,与性别的关系不大。要言之,印章更可能是墓主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某种技能的象征。

## 二 宣汉罗家坝战国墓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多次发现巴蜀青铜器。1999 年至 2007 年,在此清理墓葬 65 座(7 座空墓),1 座为无葬具的曲尺状竖穴土坑墓,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后者按葬具的不同,又分为船棺葬、木棺墓和无葬具的土坑墓三类。墓葬排列整齐,分布密集而有序,虽墓葬间距较近,但叠压打破关系较少。发掘者将罗家坝墓葬分为六期 8 段,时代从春秋晚期到西汉中期。发掘者同时认为,虽然罗家坝墓地前后六期并非一脉相承,但均属巴国的一个重要民族——賁人。<sup>[11]</sup>

出土随葬品的 58 座墓葬中,1 座年代为西汉中期;7 座出土随葬品甚少,时代不明;其余 50 座年代大致均为战国时期。<sup>[12]</sup>这 50 座墓葬中,有曲尺形土坑墓 1 座、船棺葬 2 座、木棺墓 8 座<sup>[13]</sup>、土坑墓 39 座。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仅 7 座,占战国墓葬比 $\approx 0.14$ ,若几座年代不明的墓葬均为战国时期,这个比值会更小。7 座墓中,6 座为土坑墓,1 座为木棺墓;2 座船棺葬中均未发现印章。出土印章的墓葬,时代均为战国晚期。

先看土坑墓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土坑墓有 6 座,在 39 座土坑墓中占比 $\approx 0.15$ 。M51 的墓室口部面积最大,为 3.3 平方米,在 39 座土坑墓中仅排第 9。墓室口部面积最小的 M12 为 1.1 平方米,也是整个墓地土坑墓中面积最小的,但 M12 为二次葬。另一座出土印章的 M10 为一次葬,面积仅 1.3 平方米。6 座墓中,2 座为仰身直肢葬,1 座为侧身直肢葬,2 座葬式不明,1 座为合葬墓。就葬式而言,出土印章的墓葬似无一定规律,与整个墓地以仰身直肢葬为主的情况一致。

出土印章的土坑墓,随葬品的数量多寡不

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但并非随葬品数量最多或最少的墓葬,就出土印章。印章墓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为战国晚期的 M51,计 28 件;其次为同时期的 M57,计 27 件;第三为同时期的 M25,计 21 件。然而在 39 座土坑墓中,随葬品在 20 件以上的还有 8 座,其中随葬品在 30 件以上的有 5 座。如时代为战国晚期的 M53,出土 57 件器物;同期的 M30,出土 37 件器物,等等。同样出土印章的 M10、M12、M21 的随葬品却甚少。战国晚期的 M10 仅有 4 件随葬品,其中 2 件为印章;同期的 M12 为二次葬,仅出土 1 枚印章、1 件管珠。时代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之间的 M21 出土 6 件器物,其中 1 件印章。但有 7 座未出土印章的墓葬,随葬品数量也少于 10 件,如战国中期的 M34,仅出土 2 件器物;同期的 M3,仅出土 6 件器物。可见是否随葬印章,与墓主生前拥有的财富关系不大。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随葬品较多的 M25、M51、M57,均出土几乎见于每座墓葬的陶豆;而圜底罐、平底罐、陶瓮、陶盂、陶钵、陶纺轮等,也是罗家坝墓地较常见的陶器;出土的铜剑、铜铍等兵器,亦为此墓地常见的类型。比较特殊的是,M51 出土 1 面铜镜,这是罗家坝墓地出土的唯一 1 件铜镜。M57 出土 2 件铜璜形器,除此外,仅战国晚期的 M31 出土了 1 件铜璜形器。这两类器物,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再看木棺墓的情况。

随葬印章的木棺墓仅有 M24,在 8 座木棺墓中占比 $\approx 0.13$ 。M24 墓室口部面积 1.8 平方米,是 8 座木棺墓中最小者。而墓室面积最大的战国早期 M61,达 20.1 平方米;与 M24 同为战国晚期的 M65,为 8.7 平方米。虽 M61、M65 均为合葬墓,墓室结构与单人葬有所不同;但同为单人葬的战国中期 M44,墓室面积 4.8 平方米;M40 为 4.2 平方米;M28 和 M64 均为 2.2 平方米。可见是否随葬印章,与墓室面积大小的关系不大。虽然木棺墓中可辨识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但出土印章的 M24 葬式不明,故是否随葬印章,与葬式之间的关系无从考证。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M24 出土 20 件器物，是 8 座木棺墓中随葬品最少的，其他 7 座未出土印章的木棺墓，随葬品数量都多于 M24。如战国中期的 M44，出土器物达 56 件，同期的 M64 出土器物 46 件，等等。

就器物的种类而言，M24 与其他 7 座墓相同，均出土了陶豆；出土的陶圆底罐、铜钺等，也都是木棺墓中常见的器物。

总而言之，就罗家坝战国墓葬的材料来看，是否随葬印章与墓葬的形制、规模、葬俗、葬式；墓室面积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均无明显关系，反而是在墓室面积不大、随葬品数量相对较少的墓中出土印章。就罗家坝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印章应非墓主生前阶层、等级的象征，与墓主的财富也无明显关系。罗家坝遗址的 2 座船棺葬均未出土印章，据此推测印章与使用船棺葬的群体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但罗家坝发掘的船棺葬数量过少，其真实情况还需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 三 其他典型巴蜀墓地分析

#### （一）四川荣经同心村巴蜀墓地

1985 年至 1986 年，在四川荣经县同心村清理了 26 座<sup>[14]</sup>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根据葬具的不同，分为无葬具的土坑墓和船棺葬两类。墓坑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均为南北向。葬制、器物特征、纹饰风格、组合关系基本一致，时间较为接近，属战国晚期的巴蜀文化。<sup>[15]</sup>这 26 座墓葬除 3 座残毁外，5 座为土坑墓，其余均为船棺墓。1626 座墓葬中有 16 座出土印章，比率 $\approx 0.62$ ，是迄今发现的巴蜀文化墓地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sup>[16]</sup>座出土印章的墓葬，13 座为船棺葬，1 座为土坑墓，2 座葬具不明。

先看船棺葬的情况。

18 座船棺葬中有 13 座随葬印章，比率 $\approx 0.72$ ，是迄今发现的巴蜀墓地船棺葬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总体而言随葬印章的船棺葬墓室面积都比较大，面积排在前 6 位的，均出土了印章；面积在 5 平方米以上的有 10 座，其中 8 座出土印章。而未随葬印章的船棺葬中，面积 5 平

方米以上的仅 2 座，且相对较小，分别为 5.7、5 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船棺葬中面积最小的两座也出土了印章：M22（也是同心村墓地面积最小的 1 座）仅 2 平方米；M7 仅 3.3 平方米。据此看来，在同心村墓地船棺葬中，虽然随葬印章的墓也有面积较小的，但总体而言较大，这可能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在葬式方面，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有仰身直肢葬，暂无规律可寻。

从随葬品的数量来看，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随葬品几乎均在 30 件以上，仅 2 座少于 30 件，一为 M7（24 件）、一为 M22（19 件）。而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随葬品无一超过 30 件。从陶器的种类来看，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以豆、圆底罐、平底罐、釜、钵等为主。从铜器的种类来看，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以戈、矛、剑等兵器，釜、釜等容器为主。而铁器、漆器等则在两类墓中均有发现，看不出必然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同心村墓地的铜饰物，如瓶形饰、桥形饰、鸟形牌饰、鎏金饰等，均出在印章墓中，未随葬印章的墓则无一发现。据此推测这类铜饰物应与巴蜀印章有关。

综上所述，同心村墓地的船棺葬中，随葬印章的墓总体而言墓室面积较大、随葬品较多、且多出土铜饰物。这种现象在无葬具的土坑墓中也有发生。

5 座无葬具的土坑墓中有 1 座出土印章，比率为 0.2。随葬印章的土坑墓 M11，墓室面积为 4.8 平方米，出土 17 件器物，是 5 座土坑墓中面积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其他 4 座墓室面积均小于 4 平方米，随葬品均少于 15 件。M11 也是土坑墓中唯一一座随葬铜器的，除 1 枚铜印章外，还出土 1 件铜手镯。这种现象表明，在同心村的土坑墓中，是否随葬印章与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财富等有关。

#### （二）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发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曾多次抢救发掘，至 2003 年，共清理墓葬 11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sup>[17]</sup>对于小田溪墓葬的族属，学界普遍认同发掘者的意见，为巴族墓葬；对墓地的时代则有争议，综述各家意见，大致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sup>[18]</sup>

M1 的规模较大,长约 6、宽约 4.2 米,虽遭盗掘,仍出土了 92 件随葬品。其中既有铜罍、铜釜等大型容器,又有铜铺首、鎏金泡钉等小件,但未发现印章,极可能 M1 并未随葬印章。M2 亦遭破坏,出土 30 余件随葬品,未发现印章。同期发掘的 M3 保存完好,长 4.4、宽 2.1 米,棺内外涂漆,葬式不明,出土错银铜壶等 58 件器物,但未发现巴蜀印章。2002 年发掘的 M12,是小田溪墓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M12 椁室以上遭破坏,但随葬品保存完好。墓底长约 7.6、宽 5.66~5.84 米;一椁一棺;墓主上肢弯曲、下肢伸直,头向东南;殉 1 人。M12 随葬品编号 158 件,包括铜器 48 件(套),分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 5 类;陶器 8 件;1 套玉组佩及玉璧等。此墓亦未出土印章。鉴于 M12 是已发现的巴文化墓葬中规模较大、随葬品甚为丰富的墓葬之一,发掘者认为其与 M1、M2 均为小田溪墓地中身份最高的墓主之一。M1、M2 等几座大墓的墓主应当是当时巴族的上层统治人物,M12 的主人可能为巴国王族后裔。

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发掘的小型墓葬 M4、M5 各出土 1 枚陶印章。M4 长 3.2、宽 1.15 米,M5 长 3.06、宽 1.82 米。二墓除少量陶器外,随葬品均以铜器为主,但印章却为陶制,殊为独特。因缺乏更多材料佐证,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与巴蜀铜印章是否属同一类型的器物,具有同样的功用,仅材质不同;抑或并非同一类器物,尚待考证。但小田溪墓地几座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均未发现印章,据此推断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巴族中身份等级甚高的贵族不使用巴蜀印章。印章出自小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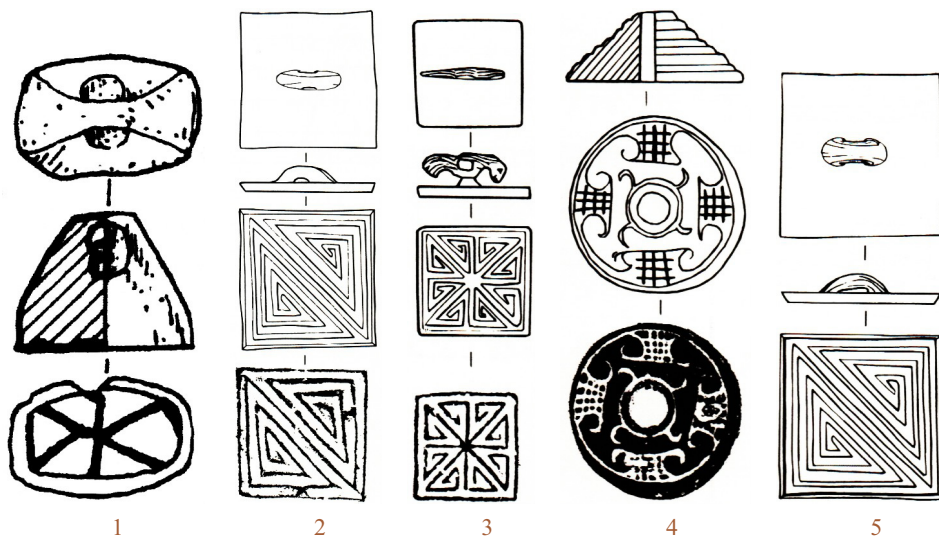
中,说明使用印章的人群,身份地位未必很高。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可能也是从事某一特殊职业或拥有某种技能的人群标识身份之物。

#### 四 结语

##### (一) 时代性

纵观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年代属战国早期的甚少,一是四川大邑县 M4,为一坑三船棺的合葬墓,1 号棺内出土 1 枚石印章;<sup>[19]</sup>一是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为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墓,1 号棺内出土 3 枚铜印章、12 号棺内出土 1 枚铜印章。<sup>[20]</sup>有学者指出大邑五龙 M4 出土的石质印章及其上的符号(图一:1),质地和刻划均较原始。<sup>[21]</sup>但年代同为战国早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铜印章,既有扁方形,又有纺轮形;前者又有桥形钮和鸟形钮之分,印面刻纹类似巴蜀符号,与战国中晚期的巴蜀印章形制相差无几(图一:2~5)。可见战国早期巴蜀印章发现的虽少,但已较为成熟。即使巴蜀印章早期使用的材质是石质,但其起源可能更早。

战国中期,随葬印章的巴蜀墓有所增加,如规模甚大的新都县马家公社木椁墓,为带一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墓,多次遭盗掘,仍出土 2 枚印章,发掘者推测墓主为蜀王,年代为战国早、中期之际,也可能是秦灭巴蜀以前,<sup>[22]</sup>总之不会



图一 战国早期巴蜀印章

1.大邑五龙 M4: 15 石印章 2~4.商业街船棺葬 1 号棺: 31、36、55 5.商业街船棺葬 12 号棺: 6

到战国早期。又如蒲江县东北公社 PDM1, 为 1 坑 2 棺的合葬墓之一, 葬具为一独木棺, 出土印章 1 枚, 年代为战国中期。<sup>[23]</sup>前文统计的什邡城关墓地 8 座战国早期墓, 无一出土印章。43 座战国中期墓中有 2 墓出土印章, 但比率仅为 0.05。这说明战国早期印章被使用的较少, 战国中期才增多。

到战国晚期, 以巴蜀印章随葬的墓远较战国中期普遍。如前文所举荣经同心村战国晚期墓地, 随印章的比率高达 0.62。这虽是孤例, 但同期的宣汉罗家坝墓地, 时代从春秋晚期到西汉中期, 出土印章的墓均为战国晚期以后。在巴蜀地区其他地点也多有战国晚期的印章墓发现。且战国晚期的巴蜀印章与前期相比, 形制多样化, 有扁长方形、纺轮形、覆斗形、铃形等; 印面除方形、圆形, 还有长方形、“山”字形、多边形等形状; 印钮有桥形、鸟形、动物形等; 印面符号更加丰富、复杂化。

宣汉罗家坝的巴蜀印章墓中, 有数座年代或可到西汉初年。而年代为西汉早期的什邡城关 M103, 所出的 2 枚印章均为汉字印, 可能至此期前后, 带有巴蜀符号的印章逐渐消亡, 而汉字印开始流行。但巴蜀印章与汉字吉语印的功用有何差别,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 (二) 地域性

巴蜀印章虽在多个地点出土, 但大致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 在这一区域, 有十余个地点出土巴蜀印章(图二)。目前出土巴蜀印章的地点中, 最北为昭化宝轮院; 24 西南至越西华阳; 25 南至云南昭通; 26 东南沿长江水系经宜宾向家坝、27 巴县冬笋坝、

28 重庆涪陵小田溪, 29 到云阳李家坝; 30 东北到宣汉罗家坝。31 在这个范围之间, 今内江、遂宁、南充、广安等地, 存在一片空白区域。宜宾至重庆的长江水系以南, 目前也未发现巴蜀印章。这可能与考古发掘的局限性有关, 也可能存在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 (三) 性质及功用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 在大多数地点, 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一般认为一个墓地的墓葬属同一族系, 上文所举的巴蜀文化墓地, 虽墓葬形制及葬具有所不同, 但以此即认为墓主不同族, 证据不足; 且不论采用何种葬具的墓葬, 均有印章出土, 除荣经同心村墓地甚为特殊外, 印章墓在其他各个墓地、各类墓葬中的比例大致相同(表一)。如此则巴蜀印章与族属似亦无关。要言之, 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 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结合出土印章的墓葬在墓地中并非面积最大、随葬品最多的现象推测, 从事这种职业或拥有这种技能的人, 在所处的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并不甚高。



图二 巴蜀印章出土地点分布图

表一 战国时期巴蜀印章墓葬比例统计表

墓地	可统计的墓葬总数	出土印章的墓	占比	船棺葬	出土印章的船棺葬	占比	土坑墓	出土印章的土坑墓	占比	木棺墓	出土印章的木棺墓	占比
什邡城关战国墓地	82	4	0.05	49	1	0	31	3	0.1			
宣汉罗家坝战国墓地	50	7	0.14	2	0	0	39	6	0.15	8	1	0.13
荣经同心村巴蜀墓地	26	16	0.62	20	15	0.8	3	1	0.33			
重庆涪陵小溪墓地	11	2	0.18									

值得注意的是，荣经同心村战国墓地 26 座墓葬中有 16 座出土印章，若说这 16 座墓的墓主都是等级较高的贵族，似不足信。可能同心村墓葬代表的这一群体的成员，大多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或具有某种特殊的技能。同心村船棺葬 M22 墓室中部略偏南处发现 2 枚印章，此墓长 2.5、宽 8 米，除去墓室两端器物堆放的位置外，中部仅剩 1 米左右的空间，简报据此推测墓主为小孩。这说明巴蜀印章代表的某种职业或技能，可能是家族世代相传的。

#### (四) 巴蜀印章与铜饰件的关系

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比较具有共性的一点是，墓中多见铜饰件，虽形制各异，但此类饰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

如什邡城关墓地 4 座出土印章的战国墓中，有 3 座出土铜饰件，比例高达 75%；而未出土印章的 78 座战国墓中，仅 2 座出土铜饰件。铜饰件以铜璜形器为主，共 17 件，分别出于 3 座墓葬，其中 2 座为印章墓：M54 出土 9 件（图三：1~5）、M95 出土 4 件（图三：6、7）。出土印章的 M33 随葬的 8 件铜器中，饰件更是占了很大比重，包括瓶形饰、双鱼饰、猪形饰、旗形饰各 1 件（图四：1~4）。M33 也是城关墓地唯一出土此类器物者。

荣经同心村墓地有 6 座墓葬出土铜饰件，这 6 座墓葬均随葬印章。铜饰件虽仅十余件，但种类丰富，有瓶形饰（图

四：5）、璜形饰（图三：8、9）、32 鸟形牌饰（图四：6）、叉形镂空铃饰（图四：7）、鎏金饰。而同心村未随葬印章的墓葬，无一发现铜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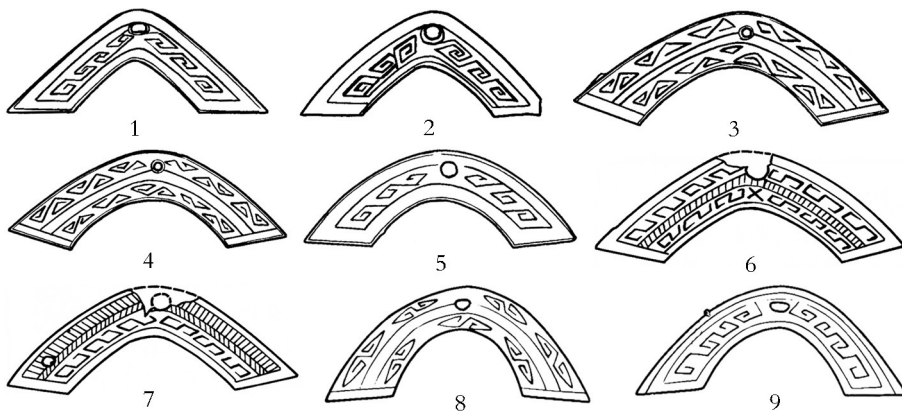
年代为战国早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中，出土印章的 1 号、12 号棺内也发现了铜饰件，如十字形饰（图四：8）、圆泡形饰（图四：9）、钩形饰（图四：10），这类铜饰件不见于同墓地其他未出土印章的棺。

上述铜饰件不论形制如何，形体均较小，长度不超过 10 厘米。这些形制特殊的铜质饰件，虽在不以印章随葬的墓中偶有出土，但多出于巴蜀印章墓中，应与巴蜀印章有关。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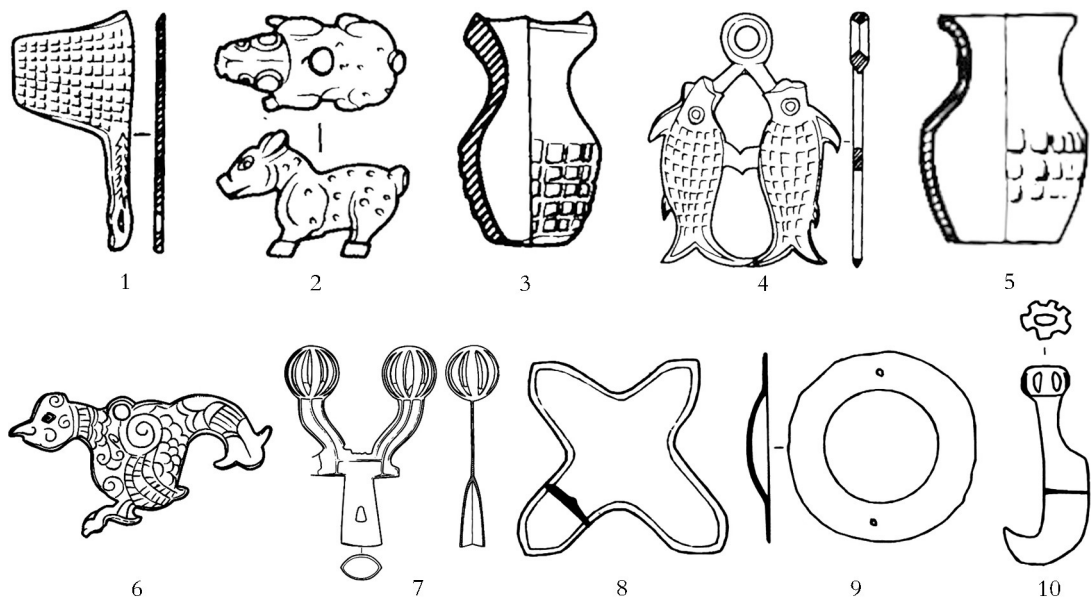
[1] 有学者将巴蜀地点出土的汉字印也纳入巴蜀印章的范畴。本文认为虽均出于巴蜀地区，但图语符号印和汉字印的性质、功用可能迥异。故本文仅讨论巴蜀地区的图语符号印。

[2] a.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 年第 1 期；  
b.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 年第 10 期；



图三 铜璜形饰

1~5. 什邡城关 M54：20-a、b、e、f、g 6、7.什邡城关 M95：7-a、b 8、9.荣经同心村 M19：23-1、2



图四 铜饰物图

1.铜旗形饰(什邡城关 M33:2) 2.铜猪形饰(什邡城关 M33:10) 3.铜瓶形饰(什邡城关 M33:6) 4.铜双鱼饰(什邡城关 M33:3) 5.铜瓶形饰(同心村 M20:19) 6.铜鸟形牌饰(同心村 M1-A:41a) 7.铜叉形镂空铃饰(同心村 M6:17) 8.铜十字形饰(成都商业街船棺葬 1号棺:35) 9.铜圆泡形饰(成都商业街船棺葬 1号棺:53) 10.铜沟形饰(成都商业街船棺葬 1号棺:54)

- c.高文、高成刚：《巴蜀铜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 d.管维良：《巴蜀符号》，重庆出版社，2011年；
- e.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论述》，《考古》2017年第10期。
- [3] a.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 b.沈仲常、孙华：《四川船棺葬的族属问题》，《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
- c.黄尚明：《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 [4] 巴蜀地区的秦汉墓中也有印章出土。但秦汉之际正值历史、社会变革时期，结合西汉时期汉字印逐渐增多的现象，此期印章的使用情况可能非常复杂。为使本文分析更符合实际，对研究对象的选取，仅限于战国早期至战国末期。
- [5] 所谓木板墓，实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在墓底放置一块长方形木板，其上置死者。发掘者认为此为船棺葬的简化形式，但什邡城关墓地战国时期的2座木板墓之一M50，长5、宽1.72、深0.3米，随葬14件陶器、11件铜器，在此墓地中属规模较大、随葬品甚多的，远较战国晚期的几座船棺葬丰富，似乎不可简单视之为简化的船棺葬。且发掘者判断为战国末期的7座墓葬，无一采用船棺葬，可能此期时人的观念、风俗发生了改变。
- [6] 巴蜀地区发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依葬具分为船棺葬、木板墓、木椁墓、无葬具的土坑墓四类。本文为行文方便，无葬具的土坑墓均简称土坑墓。
- [7]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 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管理所：《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73页。
- [9] 什邡城关墓地发掘的98座墓葬中，有5座秦墓，11座西汉墓。秦墓均为无葬具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西汉墓亦均为土坑墓，多数无葬具，并且出现了不见于战国时期的木椁墓，虽有1座可能为简化的船棺葬的木板墓，但未见一例典型的战国时期此地常见的船棺葬。有1座西汉墓葬出土了印章，但为汉字印，与战国时期的图语符号印有所不同，可能性质亦有差别。秦并天下的历史事件可能对什邡城关地区的人群构成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保证取样的单纯性，本文仅以战国时期的墓葬为统计对象。
- [10] 部分墓葬被施工破坏，但这些墓葬仍出土不少陶器、铜器，可见其随葬品可能未遭破坏或缺失，也



- 就是说这些墓葬均未随葬印章。本文出于对数据真实性、有效性的考虑，予以单独统计。
-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 [12] M33的年代上限为春秋晚期，下限至战国早期；M14、M16、M17、M19、M21、M27、M32、M48、M55等9座墓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
- [13] 简报介绍木棺墓有6座，但同时又介绍M24、M44均发现一条木痕，可能为木棺痕迹，墓葬可能为木棺葬。这与其他无木痕的墓葬明显不同，故本文将二者纳入木棺墓范围。
- [14] 其中2座为同穴合葬的船棺葬。
- [1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16] 关于不同墓葬形制的数量，报告文字介绍与墓葬登记表不符。文字介绍无葬具的土坑墓有3座，分别为M5、M11、M25，此外均为船棺葬。但墓葬登记表中，除此3墓外，M8、M12亦为土坑墓。因正文提及M8发现腐朽葬具痕，推测为船棺。本处采用正文的看法，将M8、M12作为船棺葬统计。
- [17] a.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b.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  
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d.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e.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 [18] a.同[16] a；  
b.同[16] b；  
c.宋治民：《略论四川战国秦墓葬的分期》，《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d.蒋晓春：《试论涪陵小田溪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江汉考古》2002年第3期；  
e.蒋晓春：《涪陵小田溪墓地时代再探讨》，《重庆·2001年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9]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 [2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1] 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10期。
- [22]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 [2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第5期。
- [24]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 [25]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越西县文化馆：《四川越西华阳村发现蜀文物》，《文物资料丛刊》7，第26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 [26] a.丁长芬：《从昭通巴蜀土坑墓看巴人南迁》，《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  
b.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水富县文化馆：《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9期；
- [27] 李万涛：《蜀人南迁留遗踪——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大众考古》2014年第10期。
- [28] 前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和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 [29] 同[16]。
- [3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东洋子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0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 [3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
- [32] 报告称桥形饰。